

中央音乐学院

博士学位论文

两广白话蛋民音乐文化研究

作者姓名：黄妙秋

学号：06A006

所在系部：音乐学系

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导师：田联韬研究员

提交时间：2009年4月

内容提要

本文以广东、广西两省的白话疍民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疍民”是一个特殊的、濒临消失的族群，现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部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及港澳等地。历史上，他们以船为家，泛水而居，形成别具一格的生产、生活习俗和水上传统文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广东、广西两地自古便是疍民最主要的活动和聚居之处，生活在那里的白话疍民是疍民群体中人数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一个重要支系，他们本族群的音乐文化历史积淀深厚，歌种丰富，曲风独特，极具代表性，但由于长期处于汉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甚少引起音乐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因受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变迁的影响，该群体本族群的音乐文化更是面临着快速式微和消失的危险。本文通过系统地整理、详细记录和深入研究这种濒危的音乐事项，对填补当前的学术空白具有一定的作用。

本文依据音乐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侧重对研究对象的如实记录和描述，然后再进一步予以阐释，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绪论：说明研究的目的、意义、范围和对象，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文本的理论观照、资料来源、叙述逻辑和有关概念界定。

第一章：从历史渊源、族源归属、群体特征和各地疍民概况四方面对疍民群体的总况进行介绍。

第二章：从地理、历史、生产生活习俗、社会境遇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对研究对象所依托的文化生态背景——两广白话疍民文化区，以及两广地区的其他疍民文化区进行介绍和描述。

第三章：通过历史文献归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和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现状调查和个案进行实录性记述。

第四章：将两广白话疍民音乐生活中的各种音乐成分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纳入系统进行阐释和分析。

第五章：从曲式、调式、旋法、润腔、节拍节奏、歌词等方面剖析两广白话疍民本族群音乐文化的音乐形态特色。

第六章：阐释两广白话疍民音乐文化的自然地理景观、人群景观和经济景观，以及动态的变迁景观，在多种维度上综合审视和观察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

通过对两广白话疍民音乐文化的文本研究，笔者得出：作为一种边缘文化，两广白话疍民的音乐文化一直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等需求进行着持续性的文化调适，而处于与主流文化、周边他种文化、新兴文化相互交流、互动、磨合乃至整合的动态过程之中。

关键词：疍民；白话疍歌；音乐文化系统；音乐景观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music culture of Cantonese speaking Boat Dwellers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Boat Dwellers" is a special group which is almost disappeared, and is present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southeast of China, such as Guangdong, Guangxi, Fujian, Hainan, and Hong Kong, Macau. Historically, they lived in boats on the river and the sea, which formed a particular way of producing, living and a kind of traditional culture upon the water, and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he Cantonese speaking Boat Dwellers live mostly across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history, their music culture accumulated a variety of song types and unique styles, which have singular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has gotten little attention from the music researchers, because it has always been in the "peripheral" area out of the Han culture and mainstream culture.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music culture of this group is disappearing more rapidly because of the constant coming of modern ways of producing and living.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fill in the blank of this research through systematically clarifying, recording specific songs, and deeply studying this music phenomenon that is almost died-out.

The article emphasizes on-the-spot recording and description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ccording to Musical Ethnography techniques, and makes the further explanation as follows:

Introduction

Discussion of the purpose, the significance, the range and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e article, the fruits of other research, the references, the material source, the arrangement logic and the definitions of related concepts.

Chapter 1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four aspects: The historical origin, the ancestral roo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Boat Dwellers.

Chapter 2

An introduction about the culture-ecological background—the culture areas of Cantonese speaking Boat Dwellers in Guangdong, Guangxi and other places—on which the research objects here rely, through the indicating of the geographies, history, producing and living customs, society conditions and the religion faiths, etc.

Chapter 3

The consecu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ion about the researching object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also describe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s and the individual cases 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 researches.

Chapter 4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musical ele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in music life of the Cantonese speaking Boat Dwellers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Chapter 5

Analysis on the musical forming characters of the native Cantonese speaking Boat Dwellers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from the ways of forms, modes, melodies, meters, rhythms and lyrics, etc.

Chapter 6

Ob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through various dimensionalities, to explain the sights of geography, community, and the dynamic moving in the music culture of the Cantonese speaking Boat Dwellers.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rough the text researching of the music culture of the Cantonese speaking Boat Dwellers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that, as a kind of peripheral culture, it has always been adjusting with the demands from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humanity, and staying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impact, even conformity with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ther peripheral cultures, and other new cultures.

Key Words: Boat Dwellers; Boat Dwellers' songs in Cantonese; Music-culture system; The scape of music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意义、范围和对象

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今天,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已受到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各界广泛密切的关注,抢救、保护和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行动。自1994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作为国际海洋权益和海洋经济竞争规范化的标志,对海洋古迹、遗产的保护作出明确规定以来,1998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海洋年”,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推进海洋开发和海洋保护的“启动年”,21世纪更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海洋世纪”,全球性新一轮“重返海洋”的蓝色开发浪潮已全面兴起。

我国拥有约18000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大小岛屿,众多江河、湖泊,沿海、沿江和沿湖地区面积广阔,这些地区一直是我国政区疆域、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半壁江山,蕴藏和积淀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水文化”遗产。尤其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早在汉代就开辟了经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沿海现已被称为水下考古的“黄金海域”和“黄金海岸”,据探测有沉船1000多艘,重要文物无数。1991年在广州、泉州接待了联合国“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海上线路的考察队,并成立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自古悠久的海洋开发历史和发达的水上航运贸易,铸造出灿烂多采的水上传统音乐。疍民的音乐文化便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

“疍民”是一个特殊的渔民群体,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他们蓬船为家,泛水而居,生产、生活习俗别具一格,早于秦汉以来,便在我国巴蜀、江淮、岭南及闽浙等广大地区活动,现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部的两广(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及港澳等地。居住在太平洋群岛的玻里尼西亚人,流传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水手,得到了水神的传授,航海技术大大地提高,因而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岛屿,这个水神的名字叫Tangaroa。翻译过来,刚好与广州方言称水上人家为“疍家佬”十分相似,由此推测我国疍民在历史上曾有太平洋远洋航行的壮举,^①其文化甚至对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产

^① 邓端本、欧安年、江励夫、麦国良:《岭南掌故》,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7页。

生影响。

两广地区自古便是疍民最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地之一，那里的江、河、海以及沿岸的沙田等广大地区均有疍民聚居，疍民的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据笔者调查，从群体分布、语言、习俗、信仰等特征的不同，可分为白话疍民、后船疍民（闽南语）和桂北船民（西南官话）三种，其中，以白话疍民的人数最多，地域分布最广，是两广疍民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支系。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两广白话疍民是最早上岸定居的疍民群体，现今他们已成为汉民族的一员，生产、生活习俗和文化不断受到陆民的深刻影响，族群特征濒临消失。同时，两广沿海、沿江和沿湖地区多为发达地区，大幅度、高强度的经济开发，工程建设和旅游开发，现代化、城市化和大都市化的加速发展，都导致疍民传统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与消失。近年来，两广白话疍民传统的音乐文化因受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变迁的影响，更是面临快速式微和消失的危险，乐种失传现象和传承断层情况严重，亟待文化机构与音乐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本文选定两广白话疍民的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旨在系统整理、详细记录和深入研究濒危的水上传统音乐文化品种，弥补当前水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也考虑到两广疍民由于历史、意识及生产、生活的特殊习性等多种原因，导致其音乐文化一直处于汉文化的“边缘”地带，历来备受忽视，本文意图关注其音乐文化与汉族内陆主流文化的互动融合过程，阐释其在当今社会变迁中的境遇，是符合当前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关注“亚文化”、“边缘文化”及进行“文化变迁研究”的学术倾向，因而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从广义上看，它可置于音乐学领域“汉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以及民族学领域的“族群文化研究”的大范畴中，作为汉族音乐和文化研究总课题的有益补充，通过对该课题的深入剖析，必然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音乐文化研究增添可贵的一笔。从狭义上看，它是“水上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两广白话疍民音乐文化研究属于水上传统音乐的研究范畴，我国具有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传统水上音乐文化资源，它们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学术界历来对此领域关注较少，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水上传统音乐研究虽未形成专门的研究体系，但已有众多考察研究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有：（1）对我国东北黑龙江、松

花江、乌苏里江一带古老的渔猎民族——赫哲族渔歌研究；^①（2）渤海和黄海海域山东渔民号子、吕四渔号、山东蓬莱渔民号子的研究；^②（3）东海海域的浙江沿海与舟山群岛，以及福建沿海地区的东海渔歌、舟山渔歌、舟山渔民号子、舟山锣鼓、舟山海洋舞蹈“跳蚤舞”和舟山酬神戏——龙王戏、福建蛋歌等研究，研究角度包括对乐种的歌词、历史溯源、归属问题、审美特点及艺术特色等方面；^③（4）南海海域主要是对我国大陆南部沿海唯一的海洋民族——广西京族的音乐文化、广东渔歌、广西蛋民咸水歌，以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多声部民歌等方面，研究内容包括民歌、歌节、乐器与器乐、歌舞音乐等领域，研究层面涉及（狭义音乐学方面的）音乐旋律本体研究、（广义民族音乐学方面的）音乐习俗、音乐仪式、音乐背景和音乐微观个案等、研究方法采用共时性的横向比较研究、音乐民族志调查报告、历时性的历史研究等多种，成果相对丰硕。^④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水上传统音

^① 主要的论文著述有：刘忠波《赫哲渔歌》（《中国水产》1979：第4期）；韦风、吕聂《赫哲族民间音乐》（《中国音乐》1984：第1期）；李熏凤《心里的歌，胸中的歌——赫哲“伊玛堪”歌曲的艺术特色》（《黑龙江民族丛刊》1985：第2期）；尤金良《赫哲族音乐概况》（《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第1期）；顾震夷《赫哲猎歌》（《北方音乐》1988：第4期）；毕力扬、士清《赫哲族传统民歌概论》（《艺术研究》1990：第2期）；桑海波《赫哲族民间音乐概述》（《中国音乐》1991：第4期）；朱季贤《论赫哲族“嫁令阔”和“伊玛堪”民间音乐的艺术特色》（《中国音乐》1998：第1期）；张志权《赫哲族民歌浅谈》（《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第2期）；陈恕《黑龙江少数民族传统民歌介绍（五）——赫哲族民歌》（《北方音乐》1999：第5期）；王锐《黑龙江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与乡土音乐初探（二）——赫哲族》（《艺术研究》2002：第4期）。

^② 主要的论文著述有：李学新《山东渔民号子的艺术特点》（《齐鲁艺苑》1982：第1期）、黄允箴、万年华《吕四渔号的旋律形成——寻觅音乐起源的踪迹》（《音乐艺术》1994：第3期）、星学、金西、俊礼《山东蓬莱渔民号子》（《齐鲁艺苑》1998：第2期）。

^③ 主要的论文著述有：温向东《浙江民歌的类别及其审美特点》（《怀化学院学报》1995：第1期）；韦俊云《舟山锣鼓——试探一个新乐种的发展与形式》（《舟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第2期）；施王伟《舟山渔民号子音乐》（《中国音乐》1999：第2期）；金涛《舟山海洋艺术散论》（《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第1期）；方长生《舟山民间文学的海洋特色》（《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第2期）；金涛《舟山渔歌的归属及其特色》（《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第3期）；徐波《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第1期）；孙星群《蛋歌浅析》（《中国音乐学》1993：第1期）；绵山《浅谈福建省民间音乐》（《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6：第3期）；何绵山《福建民间音乐漫步》（《中国音乐教育》1996：第3期）。

^④ 主要的论文著述有：张永东《京岛歌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第3期）；邓学文《京族民歌》（《中国音乐》1984：第1期）；纪兰蔚《京族“哈节”》（《瞭望》1984：第21期）；廖世雄《谈京族哈节舞蹈》（《民族艺术》1987：第2期）；《京族唱哈节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92：第3期）；卢克刚《京族唱哈祭仪及其音乐研究》（《艺术探索》1997：第1期）；夏沛东《激荡在碧海潮头上的歌——访京族歌会》（《中国青年科技》1999：第1期）；李静媛《访京族民间歌圩日》（《中国民族博览》2000：第5期）；杨盛龙《京族歌潮漫三岛》（《中国民族博览》2000：第1期）；蓝武芳《海洋文化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京族哈节的调查报告》（《民间文化论坛》2006：第1期）。邓学文《京族民歌》（《中国音乐》1982：第1期）；杨秀昭《京族音乐调式论》（《民族艺术》1985：第1期）；庞国权《浅析京族音乐的结构和特点》（《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1：第21期）；陈略《京族爱情歌谣表情达意方式略论》（《民族艺术》1991：第3期）；覃乃军《京族民歌的哼鸣与正规唱法的关系》（《中国音乐》1992：第2期）；邓如金《京族民歌的艺术特色》（《民族艺术》1993：第4期）；沈嘉《京族民歌的演唱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第4期）。陈驹《独弦琴源流考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第1期）；何洪《独弦琴与京族民歌关系考》（《艺术探索》1988：第3期）；黄全《京族独弦琴的

乐仍存在着很多研究空白,许多海域和沿海地区的水上传统音乐无人涉足,对其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系统地整理、归纳和进行多维研究极为迫切。

疍民因在民族属别问题上曾存在争议,一方面,他们自古由少数民族越族人构成,而且在封建时期长期被视为汉族以外的蛮族和贱民,直至20世纪80年代黄淑娉、莫雁诗、黄新美等人类学学者才对疍民的族源问题作了科学的鉴定,认为疍民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特殊的多民族的融合体,而珠江口疍民是汉族的一部分(结论详见莫雁诗《试论船民不是民族》、黄新美:《珠江口水上的居民(疍民)的研究》、黄淑娉:《汉族的一个群体——水上居民》等文章)。复杂的族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疍民音乐常常不受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疍民现又早已融入汉族或其他多民族之中,故其研究也很少受到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视,可谓处于音乐研究中受遗忘的角落。此外,由于在旧社会“疍”这种称呼被认为是歧视水上居民的侮辱性贬称,在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禁用,因此现有疍民的音乐文化研究成果大多缺乏系统性,一些零散的研究成果被囊括和杂陈于不同地区、民族的音乐研究及某些总论著作之中,较少被音乐研究者们单独抽出作为专门乐种加以研究和阐述,研究性专著相当匮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尤其1990年10月在香港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对于推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水上传统音乐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中与疍民音乐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崭露头角。

与本课题相关的论文主要有10余篇,分别是:

叶林《渔歌——广东民歌海洋里的瑰宝》(《音乐研究》1982:第1期);卢庆文《论广州地区民歌音乐特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3:第2期);梁伯钧、陈锦心《富于沙田乡土气息的水上歌会》(《今日中国》(中文版)1986:第6期);费师逊《中国东南沿海疍家人的音乐文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1990年10月,仅为会议论文提交,没正式发表);袁炳昌《从东南沿海乐器传播看民族文化交流》(《中国

制造和演奏》(《艺术探索》1998:第1期);叶林《渔歌——广东民歌海洋里的瑰宝》(《音乐研究》1982:第1期);卢庆文《论广州地区民歌音乐特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3:第2期);梁伯钧、陈锦心《富于沙田乡土气息的水上歌会》(《今日中国》(中文版)1986:第6期);费师逊《中国东南沿海疍家人的音乐文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1990年10月);袁炳昌《从东南沿海乐器传播看民族文化交流》(《中国音乐》1990:第4期);范西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音乐多声部现象及特征》(《音乐研究》1991:第1期);卢克刚、何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族民间乐器概论》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族民间乐器概论(续)》(分别载于《艺术探索》1992:第1期;1993:第1期);费师逊《海上丝路音乐学觅踪——外来音律及其民族化问题》(《音乐研究》2001:第3期);郑胜《中山民歌的特点与发展》(《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第4期);黄妙秋《海韵飘谣——广西北海咸水歌研究》(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音乐》1990:第4期);范西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音乐多声部现象及特征》(《音乐研究》1991:第1期);卢克刚、何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族民间乐器概论》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族民间乐器概论(续)》(分别载于《艺术探索》1992:第1期;1993:第1期);孙星群《蛋歌浅析》(《中国音乐学》1993:第1期);费师逊《海上丝路音乐学觅踪——外来音律及其民族化问题》(《音乐研究》2001:第3期);郑胜《中山民歌的特点与发展》(《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第4期);陈江南《闽东蛋民民歌同周边汉、畲音乐之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其中,孙星群《蛋歌浅析》一文探讨了福建水上居民——蛋民的来源及称谓,从音乐学的角度分析了盘诗风格蛋歌与歌唱风格蛋歌的音乐特点,并将蛋民的民歌、音乐文化与楚歌、越歌、楚越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断出福建蛋民与越族在生活习俗与图腾崇拜上有共同之处,其音乐文化又与宜都楚国旧习风俗歌有着共同的特点,而楚、越为古代蛮居之地,由此得出福建蛋民在远古和先秦时期可能与蛮族有族源关系的设想。

叶林《渔歌——广东民歌海洋里的瑰宝》一文扼要介绍了广东各种语系的渔歌,重点描述了惠东港口渔歌的文化背景,从乐句(衬词和衬句)、调式、曲体结构、节奏、音阶、特性音调等方面剖析它的艺术特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对渔歌改革和发展的思考和看法。

梁伯钧、陈锦心《富于沙田乡土气息的水上歌会》以短小的行文介绍了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水上歌会习俗,以及记录了广东斗门县六乡区南澳乡水上歌会的开展盛况和程序。

郑胜《中山民歌的特点与发展》主要论述了中山蛋民咸水歌、高堂歌的音乐特点及其变化发展历程。

陈江南《闽东蛋民民歌同周边汉、畲音乐之比较研究》采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闽东蛋民民歌的类别、音调及其艺术特点进行归纳和分析,并将其民歌同周边汉族和畲族的音乐加以比较,得出:闽东蛋民同周边陆地上的汉族因方言、生活习性相通,其音乐语言多趋于一致,而闽东蛋民与周边畲族音乐关系所显示的则是更多的差异性。该论文是近年来音乐学领域对蛋民音乐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著述之一。

目前,蛋民音乐文化的有关研究成果大多仅停留在对歌种、乐种分类和介绍的研究浅层,仅极少研究深入到音乐微观形态学分析和联系文化研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层面。研究多以微观研究课题为主,横向和宏观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运用较少,总体研究深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前景和空间广阔。

与此同时,在社会学、海洋学、人类学方面对水上人群的研究成果颇丰,研究主要涉及:第一,蛋民来源、族群、族名、群体历史的考证,如陈碧笙《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

称、来源、特征以及是否少数民族等问题的讨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4年第1期);韩振华《试释福建水上疍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4年第5期);傅衣凌《〈王阳朗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休休史札记之一)——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1期);林永锐《关于“蛋民”的族名问题》(《文史杂志》1988年第5期);黄新美《珠江水上居民(疍民)的体质特征》(《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林蔚文《福建蛋民名称和分布考》(《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无音《古书中的疍民》(《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黄新美《珠江流域水上居民的历史与现状》(《岭南文史》1995年第4期);曹志耘《浙江的九姓渔民》(《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蒋炳钊《蛋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朱海滨《九姓渔民来源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第二,对疍民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信仰习俗的考察,如叶显恩《明清广东蛋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陈平《水上接新娘》(《中国水产》1992年第7期);赵刚《水上人家生活变迁》(《珠江水运》1999年第10期);刘传标《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福建论坛》2003年第9期);范正义《近代福建船民信仰探析》(《莆田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刘平安《现代化进程中的珠蛋族群关系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06年民族学硕士学位论文);钟毅锋《厦门港疍民生计方式及其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袁进《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蛋人与西樵山文化关系初探》(《古今农业》,2007年第4期);刘群《跨世纪的船民研究》(《五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黄向春《从疍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陈杏梅《桂北船上人同姓婚姻习俗的考察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民俗学硕士学位论文)等。这些学术成果为两广白话疍民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一定文化铺垫及借鉴。

第三节 理论观照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具体论述主要构建在以下的理论基础上:

一、民族音乐文化志研究的文化系统观

民族音乐文化志,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借鉴文化人类学民族志调查实践的研究方法,以微观考察个案为主,研究的目的、方法和过程主要建立在田野考察、

实践调查的基础之上。^①其研究侧重如实记录对具体音乐事项的认识,对音乐活动过程、音声、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纪实性描述和符号性阐释。在描述和阐释的过程中,它是把任一音乐文化对象都看作是由若干要素以特定方式而联系起来的“系统”,认为:第一,任何音乐文化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中各部分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各部分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二,音乐文化系统具有层次性,所谓层次,即指音乐文化系统内部由于整体与部分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无限对立所形成的一系列等级及其排列次序,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既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又各有特殊之处,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形成系统层次结构的不同,每一个音乐文化系统既是较高层次系统中的子系统,同时又是较低层次音乐文化系统的母系统。第三,音乐文化系统具有动态性,系统的结构、层次、有序程度和功能状态都是发展着的,可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而发生自主或非自主的变化,因此系统是一直处于动态之中的,当系统的某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就会影响到该系统中的其它部分,从而引起的连锁式反应。第四,音乐系统具有关联性,它不是绝对孤立的,要注意环境对音乐文化系统,以及音乐文化系统对环境的相互联系和一切可能的相互作用,以及注意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结构方式,以及这种结构方式对音乐系统整体的作用 and 影响。

音乐文化系统观的上述观点,主要受宏观的“一般系统论”和文化人类学“文化整体论”的深刻影响。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各要素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同时,要素的差异和结构序列的不同使系统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特征,要素的功能特征只有在考察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相互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绝对孤立的、不受宇宙其余部分的系统影响是不存在的,系统与系统之间相互联系、渗透和转化。^②

在文化人类学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历史学派的艾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与亚历山大·戈登威泽等在博厄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整体论”,认为每个民族的“文明”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某种连续统一体。^③前者在其重要著作《人类学》中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它可以划分层次,他把文化划分成各种类型和层次,如带有极大依附性

^①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前言4-5页。

^②上述观点主要参考(奥)L.V.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秋同、袁嘉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孙纪成《系统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河北学刊》,1985(6):49-53)、陈永武《略论系统论的方法论意义》(《求索》,1984(1):75-80)等文。

^③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的游牧文化和吉普赛人的文化被称为半文化, 还有其他从属文化等等。该学派人类学家威斯勒也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结构, 这种文化结构包括各种层次, 他将文化分成“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和“文化区”等, 提出研究部落文化, 必须首先分析它的组成单元和层次。^①

此外, 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人类学功能学派持“文化必须从整体来看”的观点, 主张应通过有机地、整体地把握文化诸要素的功能, 把文化作为一个合成体来理解。他们反对把“文化”看成一些互不相干的文化特质所构成的堆积体的观点, 认为“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是具有效力功能, 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 都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像是个生物的有机体。”^②拉德克利夫—布朗1931年《人类学研究的现状》讲演中指出, 一个文化元素的意义是要通过发现它与其他元素及整体文化的关系才能了解到, 只要把文化看做一个由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整体时, 才能确定任何文化元素的意义。他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一书中明确提出“任何续存的文化都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或系统, 其中每个元素都有与整体相联系的确切功能。”^③

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 20世纪60年代, 以梅里安姆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派, 受人类学“文化整体论”的影响, 提出民族音乐学应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Merriam, “Ethnomusicology: Discuss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Ethnomusicology* 1960 (4):109), 进而提出了“概念、行为、音声”的“三重认知模式”, 他们将民族音乐的研究对象视为整体文化中的一个分子, 将其作为整体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文化系统加以综合考察, 在进行“音声”——音乐形态研究的同时, 也关注“音声”结构背后深层的“概念”和“行为”的研究。他们一般不会将其视为独立于文化之林的“纯艺术”, 而是较看重(甚至偏好)发现和考察其与别的子系统共生互融的, 更带“文化”性征的生存状态。^④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志研究, 已逐渐接受并形成将民族音乐置于整体文化中进行认识和观察的学术倾向。许多学者不仅研究音乐及其艺术性特征, 同时还对音乐的“文化内涵”以及“文化背景”(或文化语境)进行阐释性的深入研究, 即进行民族音乐文化志“深描”, 如沈洽《基诺人关于音乐的概念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一份关于基诺人“音乐观念”的调查报告)^⑤等。还有部分音乐学者在其民族音乐文化志研究中,

^①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第177-178页。

^② 同上, 第118-119页。

^③ 同上, 130-131页。

^④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年, 第7-11页。

^⑤ 沈洽:《基诺人关于音乐的概念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一份关于基诺人“音乐观念”的调查报告), 载王镇华等主编《中华音乐风采集》,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4年, 第286-305页。

积极探索和尝试对音乐文化系统的探讨。如：1986年，苗晶《运用系统论对民歌进行研究的一些设想》一文，便体现了作者对我国民歌进行系统整体性和层次性研究的思考。他在文中建议运用系统论来研究民歌，指出：“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民歌研究应该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整体系统，这个整体系统从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主体研究部分与两翼研究部分。主体研究部分的第一个层次，包括五个系统：民歌的基本原理、民歌的传承学、民歌的分类学、民歌的风格色彩学、民歌的美学。其次民歌研究的两翼科学，应包括民歌史与民歌搜集整理方法论两大系统”。^①同年，伍国栋在《论民族音乐现象的系统化结构》一文中也指出：“民族音乐学是研究民族传统音乐现象一切领域的学科。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民族音乐现象，本来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具有系统化的结构内容”，作者运用系统论层次性和关联性的思维方式，把“民族音乐现象系统化结构”视为类似网络的结构面貌，认为“网络下级大致包含音乐作品、音乐实物、音乐技艺、音乐社团、音乐人物、音乐心理、音乐行为、音乐传承、音乐交流、音乐术语、音乐文学、音乐环境、音乐功能、音乐历史、音乐风俗等若干“网络点”……这里的“网络点”，即民族音乐现象系统化结构中的分聚点，它们又各自包含更深层次的组合因素。如音乐作品的各方面、音乐功能的各方面、音乐环境的各方面……等”，并用图示表示出这一网络结构面貌及其各网络点相互间的联系。^②杨民康在《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一文中，致力于构建音乐民族志仪式系统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他把信仰体系、仪式行为、仪式音乐视为系统的要素，阐释仪式音乐的特殊性和同一性，并将仪式音乐音乐丛视为传统音乐文化大系统的下属子系统，从而试图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阐明仪式音乐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③他《傣族佛教安居节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特征》一文，成功地将系统论方法具体实践运用于微观个案——傣族佛教安居节仪式音乐的研究之中。他认为：“在傣族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符号系统内部，存在着‘个案>仪式个案>乐(仪)程>乐目’四个叠置的系统——子系统层面关系，其中每一种层次上都构成了由不同单元项组成的横组合结构关系。与横组合相对，该结构系统的纵列关系是代表一不变意义项的种种变元(变体)。”然后又从安居节仪式的仪程、乐程和乐目等不同的次级层面，探讨安居节仪式与仪式音乐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与互动结构关系。^④等等。

^①苗晶：《运用系统论对民歌进行研究的一些设想》，《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第88-90页。

^②伍国栋：《论民族音乐现象的系统化结构》，《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第136-137页。

^③杨民康：《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第22-31页。

^④杨民康：《傣族佛教安居节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特征》，《民族艺术》，2002年第4期，129-142页。

二、音乐地理学的相关理论

(一) 空间分布论

区域分类法一直是地理学传统的研究手段,如中国地理上的“中国自然地理区划”、“中国经济地理区划”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掀起了关于中国民歌“色彩区”、“近似色彩区”、“民歌方言区”、“文化色块”“风格色块”“文化区”的研究热潮,其后还出现了戏曲“板块分布论”、传统音乐“文化区”等系列研究,成为音乐地理学研究在认识论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此类研究着眼于某一族群或地域,依据音乐不同的风格、体裁、曲种、声腔分布的自然地理背景、古代文化背景、语言背景、人口迁徙情况等因素,采用静态性描述及定性手法,进行音乐文化的空间分布区位和板块的划分,进而研究各区域的特征。

地理学学者张述林在《音乐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也认为:“音乐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性,是地理学打入音乐学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地理学分支学科——音乐地理学(geography of music)。音乐地理是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它用地理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音乐结构、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地域音乐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和差异,音乐在不同地理和人文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同创作个性,从而认识音乐语言在不同地理背景中的不同表现功能。”他总结出音乐地理学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包括音乐地域差异研究、音乐空间相互作用研究、音乐空间扩散研究、音乐空间变异研究、音乐的地域比较研究这五个方面。^①

历史民族音乐学家魏狄斯指出:“每一类音乐及每一类社会都是绵延的历史过程的现代结局,这种过程对于表演者可有可无,但对于来自局外的观察者却至关重要”,^②在空间分布研究中,除了关注静态的区划分布研究以外,同时出现了用“历时性”的眼光,动态地看待音乐事象之地理流布和传播状况的研究视角。

音乐学学者蔡际洲在《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思考》一文中云:“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既可看作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也可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它不仅研究音乐文化的地理分布状况,而且研究音乐文化在一定之地理空间的传播、运动规律”,他将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音乐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按各自的研究特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侧重音乐的地理分布,其研究目的在于对某一传统音

^① 张述林:《音乐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人文地理》,1989年第4期,第42-45页。

^② Richard Widdess, "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In *Ethnomusicology: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Helen Myers,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2年版,第219-237页。

乐进行地理区划或在音乐形态的研究上兼及地理分布；二是侧重不同地区的音乐传播，既包括侧重音乐本体的研究，也包括既有音乐形态的比较研究，又考虑这种传播与一定地理环境(含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他总结有“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①

(二) 人音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是自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音乐地理学认为，音乐、人文和地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一直致力于对该三者的相互关系及规律的认识与研究。音乐学者乔建中在《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一文中鲜明地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我国音乐地理学应“搜集、整理有关音乐地理的历史文献，进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进而在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②

地理学学者申秀英在《论中国音乐文化地理学的建设》一文也认为：中国音乐文化地理学应该以中国音乐的地域分布规律、形成演化过程及地域传播特点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音乐风格形成过程中的区域环境要素，把握“人——音——地”的相互关系。了解音是人与地相互作用的结果，地域条件的差异导致音乐风格的不同，从而有效地指导人们的音乐审美、音乐创作以及区域音乐文化建设，也为中国民族音乐、地方音乐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由此认为音乐文化地理学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研究音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了解不同区域音乐特别是传统音乐的形成与区域环境(自然和人文两方而)之间的关系，从而弄清区域音乐风格的形成原因及其过程；第二，进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区的划分。在综合考虑多种影响要素，比如地域要素、历史要素、语言(方言)要素、社会要素、民族要素等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区域划分。三、探索音乐文化资源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③

三、音乐景观生态理论

“景观”一词最初来自德语“Landschaft”，英语“Landscape”源自德语，原意为“形象而富于艺术性的风景”，19世纪用于地理学，指总体环境的空间可见整体或地面可见景

^① 蔡际洲：《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思考》，《交响》，1999年第4期，第13-17页。

^② 乔建中：《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3-9页。

^③ 申秀英：《论中国音乐文化地理学的建设》，《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68页。

象的综合。^①20世纪30年代,德国生物地理学家特罗尔提出“景观生态”一词,“景观”的概念被引入生态学并形成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文化地理学认为:景观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生态过程和文化过程,是自然、生态和地理的综合体,可堪称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是客观存在的人文现象总特征的反映,是人文现象与环境特定关系的产物。^②

21世纪以来,音乐人类学领域也越来越重视对音乐景观的研究。谢勒梅在2001年《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一书中,将“声音景观”(local soundscape)一词定义为“一种声音景观,即是一种音乐文化有特色的背景、声音与意义”,主张探索音乐在时间(历史变迁的维度)和空间(地域变迁的维度)中传播、演变的动态性、多元性和多维性。^③我国学者汤亚汀在《城市音乐景观》一书中,在结合音乐人类学和社会音乐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借用大众文化研究中对全球文化经济的景观研究体系,研究城市音乐文化生活的多元景观:经济景观、技术景观、传媒景观、意识形态景观和人口景观,多视角地观察在当今多元世界各种因素组成的文化织体中,城市音乐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状态。他认为上述音乐生活景观,“组成了所谓的文化织体,音乐被编入这样的文化织体之中,由日益发展的技术所创造,由媒介传播,通过价格在市场销售,表现出人们自律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人口迁移的控制,即造成音乐文化生活的流动性。人们面对这五种变动的景观所造成的现实,以幻想——即借助音乐,创作自己“想象的世界”。^④

笔者在学习、借鉴以上诸种理论方法后,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了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及社会统计学等多种方法,以期对两广白话疍民的音乐文化作较为全面的审视。

第四节 田野工作和研究过程

本人自小生活成长在美丽富饶的北部湾畔——广西北海市,该市地处广东与广西交界,历史上曾归广东省湛江地区管辖,现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咸水疍民在北部湾海域上岸落户的地区,自幼便熟悉了海天一色、白帆点点的美景,也熟悉勇敢勤劳的“疍家人”,以及两广白话地区疍民的语言,耳闻目染过他们饶有趣味的风俗文化,印象异常深刻。

^① 程先富:《地理科学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3页。

^② 同上。

^③ 汤亚汀:《音乐的流动景观与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读谢勒梅新著〈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音乐艺术》,2001年第4期:91-94页。

^④ 汤亚汀:《城市音乐景观》,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